

剑桥美国文学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第三卷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 / 主编
蔡 坚 张占军 鲁 勤 / 译



散文作品
1860年—1920年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三卷

[美] 萨克文·伯科维奇 / 主编
蔡 坚 张占军 鲁 勤 / 译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散文作品
1860年—1920年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ume 3

Edited by Sacvan Bercovitch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opyrigh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本书全球简体中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授予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非经书面授权，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摘录、复制或转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3卷/ (美) 伯科维奇 (Bercovitch, S.) 主编;

蔡坚, 张占军, 鲁勤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5117-0524-2

I. ①剑…

II. ①伯… ②蔡… ③张… ④鲁…

III. ①文学史 - 美国

IV. I712.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2346 号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3卷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郑 锦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66509236 (总编室) (010) 66509353 (编辑部)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E-mail edit@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840千字

印 张 49.5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12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剑桥美国文学史

《剑桥美国文学史》对包含美国文学所有领域内新兴的和业已确立的各种趋势以及广阔范围进行了探讨，其中包括一些学者和评论家的论述，它们已经形成并继续成为文学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者的作品集30年美国文学评论之大成，因此既代表两代人的学术成就之间存在的分歧，同时也代表两代人学术成就之间的连续性。叙述部分在本书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使本书同以前的版本所能做到的相比，对于美国文学史的探讨既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又兼备磅礴的气势。与此同时，传统文学批评的声音虽然构成了这些叙述部分的背景，但是这个声音与形成当代文学研究的多样化兴趣共同发挥着作用。

《剑桥美国文学史》对美国多种文学流派以及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广泛的、跨学科的评论。美国文学素材的扩充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有的作品曾经被忽视，最近才被重新发掘出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而在美国文学素材扩大的同时，对这些素材进行的研究方法，无论就其数量还是多样性而言，都层出不穷。《剑桥美国文学史》中所体现的这个设计许多方面的学术和评论探讨了包括社会、文化、理智以及审美在内的多样性；同时，和以往的论述相比，也显示了一种在文学研究方面更加丰富的权威概念。

本卷涵盖了美国文学特质形成的关键时期。四位最主要的学者用大量的历史变化和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来贯穿文学史。理查德·H.布罗德黑德描述了美国文学文化的永久基础。南希·本特利定位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根源，其作为精英文化与刚刚出现的大众文化遥相呼应，既包含了高雅文学，同时也包括范围广范的外界人士：非裔美国人、妇女和美国原住民。沃尔特·本恩·迈克尔斯强调了世纪之末的小说在面对现代官僚主义出现的个体评价方面的重要作用。苏珊·米兹如茜分析了一种新的、全国范围的异质经济和文化的表现，该异质性帮助人们预言了现代美国的多元文化未来。这些论述文章一同构成了这部最为丰富、最为详尽的针对1860年至1920年的美国文学和文化的评论。

中文版序

能够把这部美国文学史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本人莫大的荣幸——这种荣幸标志着两种文化富于戏剧性的会合。美国文学传说也许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而中国文学传说则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美国文学在一个方面却比较年长：它是现代世界所诞生的第一个国家的产物。当然，在欧洲定居者到达以前，美国印第安人（或称土著美国人）已经在今天叫做美国的这片领土上居住了数千年之久，但是他们拥有的是口头文学而不是书面文学。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美国文学传统基本是使用英语的作家们的产物。它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最初是由英国殖民者撰写的，它是这些新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先驱们创作的记叙文、布道文、日记和诗歌。19世纪，它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胜利而繁荣兴旺；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作为自由主义、自由经营和市场开放的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依然经久不衰。

美国文学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比历史悠久、方面众多、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统一得多的作品主体；在对现代性的种种状况进行表述方面，它也是世界上年代最长久、内容最复杂的民族文学。它是一种富于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的文学，一种扩张和探索的文学，一种蕴涵种族冲突和帝国征服的文学，一种折射大规模移民和种族关系紧张的文学，一种反映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和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不断斗争的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从探讨自然和“自然人”方面的问题转向探讨异化、歧视、城市化和地区及种族暴力方面的问题。它们受到一种民主美学的启迪（与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欧洲“旧世界”的精英统治论针锋相对）——这是一种“普通人”和“寻常事”的美学；不同凡响的是它们对建立在奴隶制、土地的剥夺和资本主义的贪婪等基础上的文化犯下的种种暴行进行了持续的批评（这种批评往往成为激烈的谴责）。最后，这是一种始终由于有关身份的双重焦点而著称的文学：一方面它把这个国家奉为未来的土地，“明天之国”，试图制造一种关于“美国”的救世神话；另一方面它又进行自我折磨，对于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怀着一种极其痛苦的焦虑。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中国的概念是一个关于悠久历史的问题——关于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各种神话、传说和事件的问题。而美国作家所



一心追求的是重新创造自己身份这个含义深刻的现代主义问题。

自 19 世纪初以来已有几部美国文学史问世，但是其中鸿篇巨制之作只有三部。这三部文学史实际上记录了美国的成长历程。第一部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1917 年，当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第二部面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 1948 年，当时美国充分展现了其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实力。我们这部文学史是 20 世纪末叶全球化的产物，此时民族主义的含义本身已经受到质疑，在美国，对文化内聚力的一些基本说法有了一种新的、批判的意识。

这种新的意识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历史的形式和知识的形式。在过去 30 年间，学者们揭露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受到压抑或者被人忽视的各个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妇女和少数民族作品的重要性，非裔美国文化中心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地域”作家们诸多贡献的重要性。我们也已经认识到某些包罗万象的概念（包括“美国人”和“文学经典”之类概念）与其说是揭示了美国的生成过程，毋宁说是掩盖了这一过程。在知识方面，我所说的新意识与文学批评中心权威的崩溃密切相关。过去的 30 年是众多激烈竞争的理论 and 批评流派繁荣兴盛的年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等。这部八卷本美国文学史是第一部着力展示一个意见分歧的时代而不是特意表述一种正统观念的巨著。我们无意一劳永逸地为千秋万代提供一篇关于美国文学的故事；我们无意佯称发现了我们国家文学传统发展独一无二的真正关键。恰恰相反，这部文学史代表了一代美国学者的独特观点（一种多元主义，有时互相矛盾，常常变化无常的观点），一种已经从本质上对这个领域的边界加以拓展和重新确定的观点。

因此这部文学史采用了与以前几部文学史不同的格式。我在本书的序言里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种差别。为了适合这篇序言的目的，我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关于分歧的问题。此前几部文学史不是基于有关文学、历史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假定（即所有撰稿人一致赞同的文学—历史共识），就是基于权威“文学史名家”的某种宏论。而这两种选择对我们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如上所述，我们这部文学史反映了多种多样的评论方法和途径，其中不乏互相矛盾之处，但是每一种方法和途径都代表着当前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有关我们这部文学史每一部分（专论）不同寻常的篇幅。以前所有合作编写的文学史都要求专家就有关主题撰写较短的文稿：例如用 15 页篇幅论述南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用五页篇幅论述清教徒诗人安



娜·布拉兹特里特，用30页篇幅论述18世纪启蒙主义散文。然后编辑们再将这一切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每一位撰稿人都可以要求用足够的篇幅对他或她所采取的特殊途径进行解释。仅仅“充分地论述这个题目”（涵盖各种文本、运动和体裁等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见解的形成，其中每一种见解都是专家的声音，然而对于声称代表最终的权威又都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在每卷里提供的都不是一系列权威性的宣言，而是一组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叙述；它们一起构成了一种这个时期具有连贯性的对话式记叙文——一种没有确定答案的记叙文，其中的各个部分多彩多姿，有助于增进全书的深度和广度。

这是至今撰述得最为全面的美国文学史。它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著作。读者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在和各具特色的美国文学史专家对话，而与此同时，这些专家将就书中讨论的不同专题为他们提供内容最为丰富的论述。我们希望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学生不仅可以从阅读中获益，而且可以从中受到激励，用新的方式对美国文学进行思考，并且从总体上对文学研究进行思考。

萨克文·伯科维奇

致 谢

主编致辞

我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技巧卓越超群的编辑奥黛丽·科特雷尔 (Audrey Cotterell), 我感谢我的出色的研究助手肖恩·麦克克瑞利 (Sean McCreery),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为这个项目所提供了 20 年的基金支持。本卷书是这一系列八卷本中最后出的一卷, 该系列从 1986 年陆续出版。有的供稿人比其他人提前很多完成自己负责的部分, 但是他们必须有超乎寻常的耐心, 等待自己负责的那卷书的出版。我很感谢他们的宽宏、忍耐和理解。我要感谢曾任教于耶鲁大学、现任杜克大学校长的理查德·H. 布罗德黑德 (Richard H. Brodhead), 感谢曾任教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现任教于芝加哥的伊利诺伊大学的沃尔特·本恩·迈克尔斯 (Walter Benn Michaels), 他们两位在 1992 年就完成了写作任务 (尽管为了这次出版都重新审阅并修改了自己的稿件)。

我还想借此机会感谢一位伟大的美国问题研究前辈丹尼尔·阿伦 (Daniel Aaron), 我同他首次谈及这个项目, 他的睿智、洞察力和鼓励在过去的 20 年中, 给了我强大的个人和学术支持。

最后, 我要感谢美国问题研究学者中最出色的代表约翰·特西托尔 (John Tessitore), 他完成了介绍中第二部分绝大多数撰写工作, 总结了本卷书中不同部分的关系。

萨克文·伯科维奇 (Sacvan Bercovitch)

美国文学领域——1860 年至 1890 年

因为这些卷本挑选的参考文献中排除了独立撰写的作品, 因此在这里我想感谢三本非常有帮助的书: 哈姆林·加兰 (Hamlin Garland) 的《中部边地农家子》(*A Son of the Middle Border*) (1917 年纽约: 麦克米伦)、玛莎·萨克森 (Martha Sexton) 的《路易莎·梅·阿尔科特的现代传记》(*Louisa May: A*



Modern Biography of Louisa May Alcott) (1977年波士顿: 霍顿·米夫林) 和加里·沙恩霍斯特 (Gary Scharnhorst) 的《小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 Jr.) (1980年波士顿: 特恩)。我还想感谢耶鲁大学研究生论坛的一些成员, 最早他们同我一起加工了本章节涉及的材料。

理查德·H. 布罗德黑德

文学形式和大众文化——1870年至1920年

我要感谢在进行文学史研究时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得到的支持。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和现在仍就读的研究生在深化我对美国大众文化和文学写作之间的生成关系的描述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尤其要感谢贾斯廷·缪里森 (Justine Murison) 和马克·桑普尔 (Mark Sample), 他们研究美国大众文化文献, 并介绍我在这项研究中需要仔细阅读的两本书。玛莎·斯库尔曼 (Martha Schoolman)、肯德尔·约翰逊 (Kendall Johnson) 和汉纳·威尔斯 (Hannah Wells) 为我提供了研究帮助并展开了建设性的交谈。在浩如烟海的现代大众文化的专著中, 托尼·贝内特 (Tony Bennett)、安德烈亚斯·海斯曼 (Andreas Huysmann) 和理查德·萨蒙 (Richard Salmon) 的著作对我的论述特别重要。菲利普·巴里斯 (Philip Barrish)、菲利普·费希尔 (Philip Fisher)、南希·格莱茨纳 (Nancy Glazener)、艾米·卡普兰 (Amy Kaplan) 和苏珊·米兹如茜 (Susan Mizruchi) 的评论性研究对这一时期美国历史中文学和文学协会的分析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感谢卡罗尔·J. 辛格利 (Carol J. Singley) 和牛津大学出版社, 是他们给了我机会在伊迪丝·沃顿 (Edith Wharton) 的著作中发表了自己对关于帝国旅游和大众转型所起作用的观点。论文《沃顿, 旅游和现代性》(“Wharton, Travel, and Modernity”) 发表在由卡罗尔·J. 辛格利主编 (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3) 的《伊迪丝·沃顿历史指南》的第147页至179页。我特别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对话者伊莱恩·弗里德古德 (Elaine Freedgood), 她提出了很多关键的问题, 同时我也分享了她的热情。我还要感谢萨克文·伯科维奇, 在编辑方面他给了我很多指导和鼓励。

南希·本特利 (Nancy Bently)

美国生活的展望——1880年至1920年

我想感谢莎伦·卡梅伦 (Sharon Cameron)、弗朗西斯·弗格森 (Frances



Ferguson) 和迈克尔·弗里德 (Michael Fried), 他们都阅读了本项研究修改稿, 直到倒数第二稿, 并且提出了建议。我还要感谢一位曾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的马克·舍思宁 (Mark Schoening) 和目前是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研究生的凯莱布·斯宾塞 (Caleb Spencer), 他们两位帮助我为本书的出版做准备。我还要感谢《展示》(Representations) 和《新历史》(New History) 的编辑们, 他们允许我重印他们于 1989、1990 两年间出版的杂志, 其中的第一和第三章存在细微差别。

x

沃尔特·本恩·迈克尔斯

渐进的多元文化：文化、经济和小说——1860 年至 1929 年

我想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 (John Simon Guggenheim) 的同事们, 是他们使我能够完成此项工作。

苏珊·米兹如茜

大事年表

非常感谢萨克文·伯科维奇, 他为年表和介绍提出了思想深刻的见解, 他在文学和专业方便提出了很多建议, 他把我吸纳到这项出色的计划中来。我要感谢苏珊·米兹如茜, 她永远热情坚定地支持我, 她宽宏大量, 是我的良师益友。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凯利, 她的爱使我的生活和工作丰富多彩。

xi

约翰·E. 特西托尔 (John E. Tessitore)

序 言

这一部多卷本的文学史标志着美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第一部《剑桥美国文学史》（1917）引入了英语创作的一个新分支。30年后在罗伯特·E. 斯皮勒主持下编纂的《美国文学史》建立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体现了一代美国文史学家们的研究工作，他们重新划分了这个领域的界线。这些学者和评论家们主要受训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代表了美国文学创作所有分支的新趋势和既定方向，他们影响了而且将继续影响业已成为现代文学知识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文史学家的文学批评从一个边缘地域拓展为人文研究的中心。这一领域的活力反映在国内及全世界对美国文学与日俱增的兴趣、学术活动的范围和辩论纷争的强度上。重要的是，美国文本开始成为提供学科间和跨学科调查研究的主要重心。性别研究、民族研究、通俗文学研究等诸如此类已经渗透到了这个专业领域的各个角落，但是它们唯一的、最广泛的基础就是美国文学。对于多元文化和原则标准的形成所产生的争议也同样如此：争论的焦点是跨历史、跨文化的，但是争论本身则以美国著作作为主要议题。

在这些争辩中无论我们如何定位自己，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它们引发的活动提供了知识复兴和新研究的一个源泉，一部分以前被忽略、被贬低的作品被大规模地重新发掘出来。我们比以往更明白一些人称之为美国文学（复数）的东西，这一用语植根于美国不同传统、不同类型的美学流派，甚至是对文学持有不同观念的持续性上。

这些发展扩展了美国文学的含义和素材。对于这一代评论家和学者来说，美国文学史不再是某些被公认为美国文学极品作品的历史，也不再以美国文学创作中某些公认的历史角度为基础。对确定性和一致性的寻求依然持续，一如它们的职责，但是现在这些寻求是在一种批评性的气氛中进行，其中包括公开辩论、宗派主义以及充其量为不同阐释流派间的对话。

这种冲突情景标志着学术权威在结构上发生了转变。迄今为止所有文学历史惯例，从18世纪的源头开始，依赖于对主体的本质或实质有一个既定的



一致意见。今天提及意见一致听起来更像是寻求妥协或恋旧怀古。现在美国文学历史研究以多元的方式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多种声音、多层面的学术、批评和教学事业。这种环境下的权威起到把大量知识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作用。我们可以称它为变化的权威。它一部分归属于不同种类事物所带来的活力：相互争锋的追随者、大量的素材、成套的权威著作。它还部分存在于评论家进行联系的能力：把他或她的研究方法中的个性转换成挑战和交锋，由此通过与那些有时互补、有时相互冲突的阐释模式之间的联系而获取内容及深度。

2 新版的《剑桥美国文学史》在争论性和协作性上都具有权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使得它代表了它所描述的文化。我们的《剑桥美国文学史》从根本上来说是多元化的——美国文学的联盟史——但这种多元化是一个本身进行自我划分的多元性，是对这个专业和社会内正在进行的对文化价值、信仰和思维模式的争论的形象表达。这些描述当中有一些可以被称为褒扬性的，因为其揭示了社会成就和美学成就之间、技术创新和文体创新之间的关系。其他的则是明显对立的，有时到了把文学分析变成对多元主义本身的评论（甚至是攻击）的地步。但是，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对立的观点在此标志了《剑桥美国文学史》最为传统的一面。它采取的高尚道德的姿态——文学分析作为抵制和不同见解的场合——植根于对艺术的浪漫崇敬和对高雅文学的文雅态度。那种态度坚持认为，伟大的书籍里体现的理想具有普遍性。因此，它含蓄地并常常通过对社会准则和惯例，尤其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准则和惯例的直接指摘针砭，孕育了一种广泛的民族—美学反律法主义。结果是把文学当作一个自身的世界、一个较高级法则的领域来颂扬，这些法则因而提供了（用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 的话来说）对生活的一种持久的批评。到了 20 世纪中叶，那种方法一方面导致了新批评派对工业社会的攻击，一方面导致了新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出艺术的乌托邦理论。新对抗主义，包括反文化批评派的新对抗主义，不可避免地和一些遗产联系在一起。

这种联系所形成的主张与评论之间的复杂关系直接涉及了民族性问题。这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界定性问题，对澄清早期历史学家来说显而易见而未加提及的一点可能是最好的：在这些卷宗中，美国指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或者后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一部分的地域。虽然几位作者采用了一种跨大西洋或泛美比较主义框架，虽然他们中的几位讨论了用其他语言写就的作品，虽然还有人依然赞成一种后国家角度（甚至是后美国角度），但是通常他们的焦点都集中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英语创作——“美国文学”——上，一如人们在其语言和民族含义中所理解（而且仍然）的那样。



这种限制是我们有意选择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毫无疑问地反映了时间、空间、专业训练和现有资料方面的局限性；但是应当补充说明的是，我们的撰稿者充分利用了他们自身的局限。他们利用时间、空间、所受训练和新近获取的材料把民族性本身变成了一个文学史问题。恰恰因为他们聚焦于美利坚合众国的英语文学，美国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既不是一个叙述的已知条件——一个假设的前提、一个不可避免的前提或自然前提——也不是一个客观背景（这个国家的历史）。截然相反：它是很多类型文学历史探究争鸣的场所。把自己呈现为中立、对所有被公认派系都热忱欢迎的地域，最终被证明是而且总是一个风云变幻的争斗区。

在这部文学史里，美国是一个历史实体——美利坚合众国。它也是一个社会宣言，一个由口头法令建立并维持的民族，一套普遍原则，一个社会凝聚力的策略，一个社会抗议的召唤，一个预言，一个梦想，一个美学理想，一个对现代（进步、机遇、新事物）的比喻，一个包容的符号（熔炉、百衲被、多国之国），一个排斥的符号，不仅把旧世界而且把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所有其他国家和美国内部的大群体都拒之门外。一个如此构想的国家是一个修辞意义上的战场。这部多卷本文学史里的美国是探究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一个不断转换的多层面的焦点。

并非巧合的是，这些是现在文学研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两个问题。文学研究中对历史的理论化从未如此剧烈和无处不在。对历史的浓厚兴趣把这个领域里所有的特殊兴趣、我们当前存有“意见分歧”的所有派别联结起来的说法并不为过：作为观念、暗喻和神话的基础和结构；作为我们所阅读的文本的内容和我们对它们进行阐释的精神。即使我们承认伟大的书籍——一些达到不同寻常强度的语言分布——业已超越了它们的时间和地点（即使我们 3 认为它们的不朽力量是对立观念源源不断、周而复始产生的一个源泉），但是经过思考我们发现，很明显美学超越这些观点本身也是受时间限制的。对高雅艺术的美学断言和其他从信仰的诠释学到科学客观性的断言一样，受到历史的影响。我们通过一种确定的历史意识把握它们特定的超越性形式（神灵灵感的美学；具有模糊性、颠覆性、不确定性的美学）。

对偶发事件的认可同样延展到历史的书写中。有些历史作品比其他更真实；一些历史作品一度被赋予“确定性”和“综合性”的宏伟壮丽；但是所有历史作品都是由它们的历史时刻所决定的故事。本书中的历史作品也是如此。在此，我们的意图是让局限性成为开放性和无穷尽性的源泉。以前的美国文学史不是进行总体化的叙述，就是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叙述。它们所提供的或是带有权威性的单一见解，或是众多似乎只不过在进行全盘概括的简明



综述，似乎是因为专家式综述的简明风格阻止了作者个体的声音。对比之下，此部美国文学史通过大规模多音调叙述的舒展开来。由于撰稿者的数目有限，他们每一位都有详尽阐释各自观点和见解（包括前提、论证和分析）的范围；因此他们每个人的叙述通过实例而不是断言具有说服力；每一位撰稿者都通过这一代美国文史学家所共有的主题、焦虑和理想等相互联系（尽管有差异）。

我们挑选这些作者，首先因为他们有着突出的学术成就，同时也考虑到评论界对其作品的高度评价。他们一起展示了过去30年美国文学评论的成就。他们的撰稿显示了几代人之间的关联和差别。他们表现了现在归入美国文学标题下不同寻常范围的素材。他们表现出了使得这个领域有了引人注目的拓展的特殊兴奋和尽心尽力。最后，他们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对文学研究和民族志研究的兴趣的丰富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自二战以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步成为我们国家大学里师生的特征。

4 同样的特点也体现在这部文学史的编纂原则中。其灵活的结构框架意在包容美国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一些主要作家出现在多卷里，因为他们归属于多个时代。一些文本在同一卷的几个叙述里被讨论，是因为它们对于不同范畴的文化体验都是重要的。有时某一历史事件被从不同的角度讲述，因为这一事件有多元视角：例如，它既与主流社会有关，也与边缘社会有关，或者既是一个时期的巅峰，同时又是另外一个时期的开端。如此的重叠性不是计划而来的，但从写作伊始就是受到鼓励的，其结果就是观点的多样性符合了文学资料和历史资料的绝对丰富性。这也使得对个别特殊的作家、文本和运动的描述比以往任何一部美国文学史都更为丰富和精细。

萨克文·伯科维奇

这部文学史的每一卷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了上述优点。本卷具体体现于对美国文化认同形成中关键时代的多层面分析。如那个时代的作家们一样，本卷的四位作者——理查德·布罗德黑德、南希·本特利、沃尔特·本恩·迈克尔斯以及苏珊·米兹如茜——把种族和性别作为最佳的透视镜来系统研究当时发生的工业和人口变化，探求新达尔文主义和社会科学观对人类本性的看法带给人们的焦虑。因此，本卷可以视为对差异的一种探索之作，探索的方式包括自然主义小说中的象征学、情感小说中严阵以待的家庭生活，以及近乎普遍性的对种族话语的依赖。本卷也可以视为对击垮美国个人主义力量的研究之作。本书的作者们自始至终认为，在一个市场和广告的时代，对于普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



而对于作家们来说尤其如此。实际上，所有四位作者都意识到市场是文化交流的核心场所，因为在那个时代身份的动态性与贸易的动态性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

本卷使用多种评论手段，条理清晰地描绘了那个时代。布罗德黑德集中探讨新兴的文学体裁。他刻画了一个充满忧虑的作家群体，这个作家群体由出版商的商业利益所造就，反过来又影响了出版商的商业利益。他认为，这些作家们成功地利用了文学市场的供应与需求达到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且通过创作别具一格的文学作品而获得了承认。本特利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文化逻辑论证。她认为，现实主义是业已确立的文化秩序和新兴的大众市场之间的冲突点，对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迈克尔斯也认为，现实主义是主要的关注点。然而，他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与广泛的机构等级之间的结合。他辩解道，这个结合的过程成为了冲突的场所，冲突不再受到国家政治结构的遏制。我们可以把米兹如茜的观点理解为带有人类学特点：她展示了文学如何阐释国家处理其日益增长的文化多样性的代价和利益的方式，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有助于美国把自己重新定义为一个现代的国家，一个多元文化的现代性之土。

对于理查德·布罗德黑德而言，战后美国文学的传奇成为对文化分层的研究。他遵循一种松散的时间结构，回顾了职业文学领域，以写作的各种新模式在新兴的社会群体中出现的先后为序介绍了这些新模式：情感小说中的女性、“大众书籍”中的工人阶级、城市剧院中的移民、“高雅文学”中的中产阶级，以及带有“本土色彩”的乡下人和非裔美国人。事实上，布罗德黑德描绘了美国永久文化传统的根本——其特点就是等级化的、利益驱使下的生产和分配体系——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文学的分裂，即分裂成风格多种多样、主题丰富多彩、写作意图和社会影响力形形色色的多种形式的文学。布罗德黑德强调了出版业作为公共行为的重要性，认为出版业受到阅读（和付费）群体的需求和愿望的影响。布罗德黑德阐释了职业空间，或者说是“文学的文化”，这个空间中包括既妥协于职业需求又抵抗职业需求的作家们，如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查尔斯·切斯纳特（Charles Chestmutt）和萨拉·奥恩·朱伊特（Sarah Orne Jewett）。这些文学的文化通常起到限制在此文化圈内作家们的创造性工作的作用。然而我们也知道，这些文化同样也为那些曾经被文学圈排挤在外的作家们提供了创作机会。

南希·本特利把19世纪现实主义的起源定位于精英文化对新兴大众文化既肯定又反对的回应。她的叙述包含了那些高雅文化的实践者，如威廉·狄恩·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前者



不偏不倚的分析作品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社会科学类型的美学，后者把审视的目光投向人的内心深处，探索了可能引发混乱的现代性对人的思想和品位的影响。更广义上来讲，她的叙述追溯了美国“看”的方式的转变。战后早期年间的“看”是由博物馆文化所声称的客观性占据主导，然后经历了现代化的严峻考验，之后过渡到作家与文化之间高度主观性的关系。她认为，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现实主义是对感伤情调、感觉主义以及流行文化宣传的一种策略性反驳。然而，本特利也指出，现实主义最终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渗透性的类别，在精英文化中为那些社会边缘人创造出了一个空间，同时，作为一个高度脆弱的类别又极易受到大众文化极端的影响。现实主义为诸如查尔斯·切斯纳特这样的局外人提供了机会，使得他们能够在艺术名望的环境下关注社会问题，同时现实主义也招致了诸如 W. E. B. 杜波伊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挑畔。现实主义被其量身定做的人群——非裔美国人、女性和美国土著人——所利用，逐渐地迫使文学精英们摒弃了现实主义而转向更加具有自我意识的写作模式。到 19 世纪末，现实主义把他们带进了极其时乖运蹇的美国现代主义。

在沃尔特·本恩·迈克尔斯的叙述中，世纪交替时期的小说承担了由来已久的文化机构作用，成为美国社会上演社会和政治斗争的空间。迈克尔斯超越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一般性差别，即自然主义对生物和社会决定论心醉神迷，而现实主义把小说转变为一种新的新闻精神。他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共同点，揭示了它们由来已久的价值。他理解中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文本都把自身定义为“对社会生活新形式的想象和阐述”，因此两者同质同源。他尤其强调在现代官僚主义到来之际，小说在重新评价美国个体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迈克尔斯的研究围绕着三组比喻进行，即可见性和种族、欲望和资本主义、工作和事业，他以时间顺序记录了文学表达中（以及整个社会范围内）社会依赖和社会独立之间日渐模糊的界限。在他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中，马克·吐温笔下的康州美国佬、凯特·肖邦的艾德娜·庞特利尔以及欧文·威斯特的弗吉尼亚人都自觉地推动着爱默生时代英雄个体的理想主义转变为 20 世纪中叶组织人的现实主义。

苏珊·米兹如茜戏剧性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分裂。她把紧随内战之后的数十年表现为一个“多样化所带来的诸多具体危险被广泛概念化和争论”的时期，展现了文学对体现社会、民族、种族、美学、宗教和经济方面的国家多样化的回应。她首先通过自己对内战的回忆分析了社会的分裂，审视了每一次接踵而至的分裂危机——解放和重建、广告在创建消费国家的过程中无处不在的影响、大工厂时代对工作的重新评价，以及个体在一个由托拉斯



和强盗式资本家掌控的社会中重要性的衍变。简而言之，她详细论述了整个文学界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的回应。她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涵盖了主张社会同化的布克·T. 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和玛丽·安婷（Mary Antin）的冲动，韦尼姆卡（Winnemucca）的文化抵抗，托马斯·狄克逊（Thomas Dixon）对盎格鲁—撒克逊的幻想，以及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公司理想主义（在描述 1880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乌托邦小说大量出现的那个章节）。她的诠释是对新生的社会科学和不断成长的公司资本主义的持续评价。米兹如茜令人信服地总结道，人们坚持文本之间具有差异性，甚至那些希望在国家中促成更广泛的文化同一性的作家们也是如此，最终带来了现代美国“文化多样性的产生”。

米兹如茜的观点强化了本卷的主题。所有四位作者追溯了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文化的历史，从内战前同质化的主流文化一直写到分裂的、真正多元化的、多样化的文化概念。为达到此目的，他们突出强调了文本与背景之间持久交互的关系，以多种方式表明了文学在文化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所有作家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 1860 年至 1920 年间美国文学最丰富、最详尽的论述。

8

萨克文·伯科维奇
约翰·E. 特西托尔